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报告文学篇)

- 作家的天职是讲好故事,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有良心、良知,具有强烈的前沿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 报告文学作家要善于从生活中撷取那些最精美的故事,或者去撷取谁都不太注意的场景。
- 细节和人物是写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对于报告文学来说,一个细节可以救活一个人物,甚至一篇文章。
- 好故事必须要有好的讲法,要想讲好中国故事,必须重视方法和技巧,耐心打磨作品的结构、语言等。
- 讲好中国故事,必须以人的价值为轴心,开掘人物所承担的时代性。
- 在资讯发达的全媒体时代,报告文学要得到更多读者的肯定,还要进一步把握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梁鸿鹰:

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如同一条流光溢彩的中国故事长河绵延不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中国人在奋斗自强的路途上创造的新故事,时时鼓舞着作家们用心去发现,用笔墨去书写。报告文学是时代的文体,与中国故事贴得最近,当代报告文学作家倾情记录中国故事,留下了许多动人篇章,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其间的得失甘苦必将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启迪。

讲好中国故事 是报告文学的使命

何建明: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之一,就是希望我们文艺界要讲好中国故事。通俗意义上讲,作家就是编故事、讲故事的人。一个人学习知识、积累经验、了解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听故事开始的。小时候我们都爱听故事,因为一个好故事会让人一辈子忘不了,并且从中获得一生的教益,比如“东郭先生与狼”、“司马光砸缸”和“铁杵磨成针”等这些经典故事,为什么传了一代又一代,教育和影响着不同时代、不同价值观、不同年龄的人,就是因为这些故事生动精彩且蕴含了深刻的做人道理和人生经验,都具备了入心、入脑的艺术感染力。从我个人的创作经验来看,30多年来,我基本上都是在讲“中国故事”。

理由: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60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迎来了伟大的社会进步,这种进步是由一件件生动鲜活的事情组成的,是由一个个平凡的小人物推动的。用史学的尺度来衡量,这是“个人规模的历史”,是色彩缤纷的峥嵘岁月。讲好这些故事是作家的天职,既需要作家有智慧,更需要作家有良知,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后者更是重中之重。

徐剑:

报告文学的写作难度是非常高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具有社会的良心、良知,承担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具有浓烈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还必须具有前沿精神,关注现实思考现实,特别关注社会问题和国计民生,绝不回避生存矛盾,致力于社会进步,预见社会发展,这就构成了报告文学作家独特的表情和品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面对光怪离奇的社会,面对诡谲多姿的人生和命运,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具有丰沛的精神素养,丰沛的情感素养,丰沛的知识素养。面对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面对一位经历沧桑的老者,你能不能站在一个更高、更巧妙的视角,以一种历史的、哲学的、美学的眼光和视野生成关于历史、时代、哲学和文化、美学的最终发现,无不在考验着作者的能力。

报告文学作家讲述中国故事时,要有写鸿篇巨制的野心和精神担当。因为就作家的写作而言,一生要直面这么几个词:精神、命运、死亡、爱情。古今中外的精品之作、扛鼎之作、传世之作,无一不在文学叙述之中体现了精神思想元素的独到发现与深邃挖掘。上乘之作,一定是精神品质高拔的,站在民族的人类的精神高峰之上,有独独然而涕下的情怀,有时代、民族、个人和历史的命运感,敢于直面死亡的残酷与冰冷,抒写爱情的美丽与凄怆,直通读者的心灵,为受众再造一个天堂。可以说穷尽一生,我们困惑于此,我们的突破也在于此。

丁晓平:

我认为,中国故事,就是以中国和中国人民为核心、真实再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客观正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准确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与心声,完整体现中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气质,全方位、大视野、多角度地呈现中国的发展与进步的文学作品。报告文学在表现这些主题时有先天的优势。我们知道,报告文学题材是没有时间界限的。因此,现实题



前排左起:鲁光、理由、徐刚、何建明
后排左起:丁晓平、马娜、李琰璐、徐剑、梁鸿鹰、黄传会、王宏甲、赵瑜、王国平

理由的《扬眉剑出鞘》承载着无数中国人心底的强国梦,鲁光的《中国姑娘》奏响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何建明的《国家》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感染人激励人,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唤醒人们对大自然的深沉之爱,王宏甲的《智慧风暴》引发一股经久不息的知识旋风,黄传会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为奋斗的打工者写心画像,徐剑的《东方哈达》以高原建设者们的无私无畏温暖人,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传递文学的恒久诗意,丁晓平的《五四运动:历史的现场和真相》回望一段不平凡的辉煌。马娜的《天路上的吐尔库》、王国平的《一枚铺路的石子》、李琰璐的《落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采访记》聚焦当代中国人平凡而不普通的人生,闪烁着动人的光彩。

为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和文艺报社共同主办“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系列座谈会。3月30日,首场座谈会邀请部分报告文学作家围绕相关话题各抒己见。现刊载部分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材和历史题材应该是报告文学两条平行前进的钢轨,把报告文学送达更远的地方。

李琰璐:

讲述“中国故事”,并非简单地讲故事而讲故事,我们是在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述出中华民族在一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想象与创造一个新世界与未来。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对于作家来说,我们可以讲述一个人的故事,可以讲述一个家族的故事,也可以讲述一个阶层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将个人、家族或阶层的故事讲述为“中国故事”?这需要作家深刻的洞察力,开阔的视野,以及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自觉意识。

歌德在他的时代曾经以这样的句子形容人类精神深处的激情与困惑:灵魂永远骚动着渴望安宁,肉体永远劳作着寻觅休息。21世纪的我们不论从哪里出发,似乎还是能够碰见这两句话。我从这样的句子里感受到另一种巨大的挑战和渴望。对于一个以写作为重要生命形式的人,它洋溢出一种不屈不挠的悖论的魅力。我们相信,在每一时刻都有不可计数的信息沿着光纤飞奔的当今世界,文学依然是不断擦亮我们心灵的智慧之书,它会使精神欢愉,使灵魂有光,使天地温暖,使生命芬芳。我愿用这段话不断提醒自己:在激流中不被瓦解,努力保持一个写作者的宁静、独立和尊严。

讲好中国故事,重要的是解决好讲什么、怎么讲和怎样讲好的问题。讲什么,就是要把握时代脉搏,关注发展大势,把社会进步的主流展示好,把人民蓬勃向上的风貌展示好。怎么讲,就是要真实、生动、鲜活地讲,真实的故事最精彩,基层的故事最生动,努力出新出彩,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见精神。怎样讲好,就是要走出办公室,走出高楼大厦,在基层心中才会有群众,在现场心中才会有感动。

在生活中发现真实与故事

何建明:

报告文学作家要善于从生活中撷取那些最精美的故事,或者去撷取谁都不太注意的故事。前者是人类对美好和理想的共同取向需要,后者是因为人类有共同的好奇心。好故事的标准,是内容精美和形态精致。去年清明节前我写了一篇长长的纪实散文,叫《雨花台的那片丁香》,故事讲了女烈士丁香的男友阿乐先生一生对亡妻的唯美和凄美的感情,这种唯美与凄美融合起来,就是一种壮美。壮美将一对革命者的爱情升华成一种崇高的理想和

信仰。这是一个大家可能都不太注意的故事,我写它并不是要猎奇,而是想从那些平常的、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寻找到可以呈现特别不平常的、闪耀光芒的故事。比如农民代表吴仁宝,他的故事大家都熟悉,建设了一个中国最了不起的新农村。在他去世时,关于他过去的那些事引发了不少争议,当时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篇《吴仁宝的遗产》,里面讲了吴仁宝鲜为人知的许多故事,发表后效果很好,重新塑造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一个基层共产党员的形象。

不是所有的故事对一切都具吸引力,而经典的好故事则必定能打动所有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它必定具备了人类情感和社会进步的普遍价值意义,以及超越一般水准的审美意义。比如我们常常会说那种纯洁无瑕、出生入死的爱情而感动;常常会对弱者产生怜悯心;对真理无限崇拜与追求,对邪恶充满蔑视与仇恨等等。明白这个道理后,我们在创作“故事”时,就自然而然地有了一个具象的对象。这很重要,因为这个具象的听故事的对象,可以帮助我们校准“故事”的方向,即作品的主题意义。当年我写《落泪是金》时,在创作时就很清晰地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我的“故事”,来了解和关心那些读不起大学的贫困生,并最终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后来《落泪是金》中那些贫困生的故事基本上都让公众采纳了、感动了,所以作品达到了预期效果——引发了全社会对高校贫困大学生的关注与献爱心,政府也出台了诸多相关政策。

黄传会:

报告文学作家不能像小说家那样展开想象的翅膀,去虚构、去编造、去揣测。只要作家真正深入生活,便会发现生活本身就是文学,生活中蕴藏着最曲折的故事,最独特的细节,最深刻的思想。我在创作《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时,密集采访了许多从农村走出来的“80后”、“90后”打工青年,他们给我讲了很多自己的和别人的故事。一次,我被一位推销足浴盆的小伙子吸引住了,经过简短的交谈,我得知他爷爷和父亲都是农民工。我隐隐意识到这可能会是一个好故事。当我深入到这个家庭之中,和他们交上朋友以后,我发现这的确是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家庭。小伙子的爷爷是我国最早一批农民工,当过清洁工,看过仓库;父亲算是第二代农民工,做过家具,干过装修。到了小伙子这一代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与土地割断了联系,他们从进城的第一天开始便有了“城市梦”。这个一门三代由农民工组成的独特的家庭,完全可以说是我国农民工30年历史的缩影。这样的故事不到生活中去寻找,靠编造是编造不出来的。

为了书写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的历史,我曾经到海军干休所去寻找“老潜艇”们,他们都已经走入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听他们讲述当年初建海军潜艇部队的一个个传奇般的故事,让人怦然心动。在南京,我遇到一位“老潜艇”,他晚年得了中风,行动困难,无法言语。他的老伴告诉我,1988年,在大海中潜航了40年的“老潜艇”离休了,但他对海军潜艇事业的感情丝毫没有减弱。他有个固执的爱好——每晚必看电视台的天气预报,每当听到明天东海海区天气以晴为主,无风浪时,脸上便会露出安详的神色。一位同大海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潜艇”,他的心中深藏着一片辽阔的海。这样的细节不到生活中去,靠虚构是虚构不出来的。

王国平:

报告文学是文学向时代递交的一份“证词”。追求真实,或者说真实性、真实感,是报告文学的立身之本,是它的血脉和基因。报告文学的生命在于目光紧紧锁定现实,要么把现实中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用文字记录下来,要么让悠远的历史“穿越”到当下,与现实进行对话,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当下现实,正所谓“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故事被讲述的年代”。报告文学还是时代向历史递交的一份“证词”。它所关注的事、描写的人,由于深深打上了“真实”的烙印,将可能被后来者轻易地“照单全收”,视为“信史”。所以,报告文学作家的天职是不断地向真实、事实逼近。

用报告文学讲述中国故事,要经得起时间的淘洗和检验。这关系到如何遴选故事,如何获取故事,如何讲述故事。遴选出来的好故事应该是品质过硬、品相纯正、品味醇厚的,要与时代的气息相契合,从故事中映照出时代的风雷激荡、波澜起伏;要符合当代审美情趣,进入现代语境;要感应到人的心灵秘密,让人觉得可以亲近、可以碰触,产生精神愉悦和灵魂颤动。获取故事的途径不外乎舍得下身段,到生活深处浸泡。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始终“在路上”。动笔前,作家应该在“在路上”,去丈量人物的心灵长度,去捕捉大地的生机勃勃,从中梳理出故事的脉络,翻拣出故事的角角落落。即使回到家里,面对稿纸和电脑屏幕,心也应该“在路上”,让时代的动感旋律撑满字里行间。

细节可以救活文章

理由:

前天入睡前随意翻看一部清代人写明代故事的《醉醒石》,第一章写的是一个为人极其清廉的小吏。看得出故事素材十分精彩,但作者没有写好,其原因



于缺少丰满的细节。这引起我对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思考。

我们通常看到的文章有三种情形。内容精彩,形式上乘,这样的作品难能可贵;内容大于形式者,非文学也,可能是学术论文或实验报告;形式大于内容者,有人喜欢看,例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回想主题内容记不太清,只记得文笔曼妙,还成为经久流传的经典。这说明形式对于文学作品极为重要,包括取材、谋篇、结构,以行动为特征的情节与细节展开,还有语言文字的修养……

我的早期作品《扬眉剑出鞘》从采访到写作都在击剑运动队的宿舍里完成。这项运动身手动作极快,转瞬胜负分晓;为了弄清楚现场情境,我请教教练持一把剑,我拿一把剑,就这样一剑一剑地比画着去还原现场事件。随后把单人床的铺盖一卷,坐在小马扎上写完全稿。正是这样对生活细节的考量和认真还原,最后成就了这部作品。

鲁光:

细节、激情、人物是写好中国故事的关键。我在写作《中国姑娘》时因为想进一步了解队员周小兰和整个队伍的情况,就冒冒失失地问周小兰,你写过日记吗?某年某月某日有一场比赛你记录了吗?她说我有记录,我能看下一吗?当时郎平在旁边,说鲁老师,这个不能看,女孩子的日记你怎么能看呢?周小兰说,老师,你看一眼,咱们拉勾,你不能往外写,也不能抄,也不能告诉别人。我说行,没问题。她就把日记给我了,她的日记很简单,我一个通宵就看完了,看完觉得很精彩,特别是表现了当时女孩子的一些爱情生活,她写以前出去比赛心里很轻松,那天突然之间心被拴住了等等,深深打动了。我当时我跟她拉了勾了、保证不能用,最后还是用了,写了8000字,实际上也得到了她的默认。所以,对于报告文学来说,细节很重要,一个细节可以救活一个人物,救活一篇文章。

黄传会:

报告文学必须具有“文学性”,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在一些报告文学作品读者不满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报告”有余,“文学”不足。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指的是这种文体的审美特性,它是由多方面组成的,比如题材之美、精神之美、风格之美、语言之美等。不过我认为,报告文学“文学性”最基本的一个是要求要有好故事。

精彩的故事要靠精彩的细节来支撑,而精彩的故事和细节都需要作家到生活中去寻找。通过多年的创作实践,我深切地体会到,每一部优秀报告文学的诞生,都是作家与生活的一次贴近,都是作家对生活的一次思考。你越深入生活,作品就越扎实;你越深入生活,作品就越有深度。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徐刚:

1988年,我为电视纪录片《绿色长城》撰稿,第一次踏访三北防护工程。在山西保德有一个老人叫张侯拉,使他远近闻名的是山里小孩唱的一首顺口溜:“保德有个树疯子,住山洞吃黑豆,不换衣服不洗澡,种树不管家,他叫张侯拉。”我见他时,林业局刚把他从九塔山的山洞里接出来,我仿佛见到了一个“野人”,我几乎无法采访,他总是说两句话:“人活一辈子,总要给子孙留点什么”;“走不动喽,走不动喽”。他已经86岁了,用白面换黑豆,到林场捡树苗,为了省去上山下山的时间,他住在九塔山的一个山洞里,吃黑豆、野菜,穴居10年。就连专家也困惑:这些种植在水土流失区流泥淌坡的24万棵柳,一个70多岁的老人十年不息仅凭一己之力是怎么种下的,而且都活了,生意盎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侯拉的故事是九塔山上的树告诉我的,我在进入张侯拉手植的那些林子时,我在他住了10年的山洞中寻觅时,能看见张侯拉的脚步,能闻到张侯拉的气息。在这些从生活中生发出的细节里,文学的思绪随之而来,张侯拉的故事是有根的,充满野野的气息,树叶青草能牵动我的词语。(下转第3版)